

# 戊戌变法时翁同龢 罢官原由辨析

戴 逸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正当维新运动紧锣密鼓地揭开帷幕，变法措施开始颁布之时，光绪皇帝忽然发出一道谕旨：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见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许多人震惊得目瞪口呆。翁同龢的学生叶昌炽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八日晨，阅邸钞。虞山师（指翁同龢）奉旨放归，朝局岌岌不可终日，如螭如塘，如沸如羹，今其时矣。”

值此关键时刻，光绪帝何以把教育自己二十多年的老师、曾推荐康有为、积极支持变法的翁同龢罢了官呢？当时许多人认为：这道谕旨并非出自光绪帝的本意，而是慈禧太后强令他发布的，其目的是，剪除光绪帝的羽翼，打击刚刚开始变法运动。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得到人们的认同。

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翁氏的罢黜，不是慈禧的主张，而完全是光绪帝所为。理由是戊戌维新前夕，翁同龢与康有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光绪相信康有为，怕翁同龢在位妨碍变法，因而将翁“开缺回籍”，赶回老家去。持此见解者，国内外亦不乏其人，最有代表性的应推旅美华裔历史学家肖公权先生。他在《翁同龢与戊戌维新》一书中，对翁同龢罢官原由作了全新的解释，并对翁的思想和政治品德颇有责难。

肖公权先生是著名学者，著作繁富，造诣很深，但他对翁同龢罢官原由和政治评价，论证并不充分。肖先生已作古多年，但类似的见解尚在流行，故此笔者仍不免叩疑诘难，一吐自己的想法。

肖公权先生承认翁同龢与康有为有过一段密切的关系，因翁的推荐，康有为受到光绪帝的器重。但“翁与康的亲密关系并未维持很久。在1898年元月至5月间，北京的情势改变了，翁对康的态度亦随之而变，促成这种改变的理由之一，可以从审察当时的情况中推测出来。康有为大胆的观点以及肆无忌惮的作风引起传统派人士的疑

惧，许多死硬派官僚极力反对变法。翁那时已是人所共知的康有为之赞助者以及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因而迅即成为‘保守派’的众矢之的，他的政敌自然乐于攫住这个机会来为难、打击他。在五月底，情况变得对翁氏十分不利，许多人接二连三地参劾他。正在这个时候，翁氏开始对帝表示他对康氏的憎恶。”这是说翁同龢为了避免别人攻击而疏远康有为，又说翁康两人对“改革的方向和范围迅速发生了歧见，结果翁曾试图阻止康的激进思想”，“康氏想要利用光绪帝来对抗慈禧太后……仅仅这个因素就足以使翁同龢与康有为分手”。“翁同龢两面做法，一方面赞助他所领导的改革，另一方面压抑其政敌所推动的现代化运动，使许多改革派和所有保守派都不欢迎他。”<sup>①</sup>

肖先生引用《翁同龢日记》中的两段：

“四月初七日……上命臣，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变制考》知之。”

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寓园也。”

肖先生据此说：“翁显然想要摆脱与康有为的关系，希望缓和其政敌的反对，这是一种卑劣的自保手段。它可能震惊并触怒了光绪帝，因而确实使翁氏陷入极大的困境——夹在其顽强政敌之反对与迄今一直信任他的光绪帝的不悦之间。”<sup>②</sup>并推想：翁屡次受到弹劾，可能是康有为唆使御史们所为。

我认为，肖先生据此立论，认为翁同龢罢官出于光绪的意旨，论据是不充分的。

首先，根据《翁同龢日记》来论证翁康关系，使人不能无疑，尽管翁的日记史料价值甚高，但在翁康关系上则未可全信。因为戊戌政变，康梁逃亡，六君子被戮，翁同龢

的处境很危险，随时可能获重谴。故戊戌前一段日记，经过重新缮写、删改、隐讳了翁康的真实关系。汤志钧先生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已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即以翁同龢推荐康有一事而言，这本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翁日记中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甚至矢口否认自己推荐过康有为。翁同龢不敢把自己和康有为的真实关系和盘托出，极力和康划清界线，以免被守旧派抓住把柄，惹来更大灾祸。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翁氏重缮、删改日记是完全可能的，其用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以翁同龢日记来论证翁康关系，就难免有失偏颇了。

为了弄清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当时许多人的言谈中找到证据。

第一位即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肖公权先生说，由于翁康之间的矛盾，翁“憎恶”于康，导致光绪帝罢黜了翁同龢。如果这样，康有为必会有所表露，但查阅康的言论，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

“（四月）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是日，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率三军，著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于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

时旧党焰甚炽，常熟频被劾。

（翁）以割胶事为罪谤所归，荣禄嗾其私人劾之，常熟卒以是逐。常熟去官后云悔不听我言也。”

这里，康有为十分明确地指出：翁的罢黜出于西太后的“懿旨”，翁被弹劾是“旧党焰甚炽”，是荣禄嗾使（并非如肖公权先生怀疑的康有为的嗾使），而且翁被罢黜，康有为感到心灰意冷。可见，翁康矛盾导致翁被罢黜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再以康有为在不同时间所写的诗为证。

第一首是政变后康有为刚刚逃到日本

时所作的《怀翁常熟去国》，诗云：

“胶州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苦，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中说的是康有为在德国占领胶州湾后，第五次上书，被阻未上达，欲离北京，翁同龢亲至南海会馆挽留。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有康有为的注文：“十一月十九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闥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见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感遇变法，且累知己，未知天意何如也。”不仅述说了翁同龢从前到南海会馆挽留康有为的情形，而且说到翁罢官后还劝康不要离京，康有为对翁同龢极为感激，绝无排挤翁的迹象。且称“感遇变法，且累知己”，康有为还把翁同龢比作萧何，将自己比为韩信，以为翁的罢官是受自己的牵连，可见他与翁的关系是何等密切。翁同龢罢官后在北京停留了半个月，于五月十三日启程回常熟原籍。在这半个月间可能曾和康有为有过联系，仍劝康不要离京。由此可见，翁同龢日记中“与康不往来”之说不可全信。

康有为的第二首诗是在得知翁同龢逝世后所写《常熟翁公哀词》：

“海山凄断海风酸，忽听山颓最痛辛。  
誉士岂闻才百倍，救公何止赎千身。  
萧何能荐登坛将，王猛曾为人幕宾。  
岂料七年悲党狱，竟成千古痛维新。”

对翁同龢的悼念之情，极为深挚，再一次把翁比作萧何，丝毫没有流露什么翁康矛盾。

第三首诗也是悼翁同龢的哀词：

“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  
王明资旧学，变法出元臣。  
密勿谋帷幄，艰难救国民。  
峨峨常熟相，凿空辟乾坤。”

称翁同龢为中国维新第一人，“艰难救国”、“凿空乾坤”，赞誉备至，评价极高。如

果翁康之间在戊戌年已有严重的矛盾，康有为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吗？

第二位人物是维新变法的另一领袖梁启超。他当时也在北京，是深知翁同龢开缺回籍底细的人。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写道：

“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觐见，而二十七日西后忽将出一硃谕，强令皇上宣布，其谕略云……（即翁同龢开缺回籍之谕，从略）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

梁启超接着又指出：翁同龢罢黜起因于谏阻巡幸天津。他说：

“荣禄讽御史李盛铎奏请阅兵，因与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议，盖欲胁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废立。此意满洲人多知之，汉人中亦多有为皇上危者而莫敢进言。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唯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借势以去之，皇上之危险，至此已极矣。”

按照梁的说法，翁同龢开缺不仅不是出于光绪主动，而且是由于翁极力保护危在旦夕的光绪帝，谏止天津巡幸的结果。

梁启超自言，他写作《戊戌政变记》，因出于政治需要，或有夸张失实之处。但此处所谈翁同龢罢官原因却系得自可靠方面消息，既非事后推测，亦非道听途说。梁当时给他的好友夏曾佑写过两封信，一封信中说：“二十八日康先生召见，闻今上圣明，诸大臣皆无及者，实出意外，惜覃溪（覃溪为翁方纲之字，此处指翁同龢）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未能大启天下之蒙耳。康先生从容度无所补救，亦将南下。”另一信中则说：“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俟见时详之。南海不能大用，菊生无下文，仆之久不察者，率皆由此而生也。仆已于前日举行察看之典，

未知下文如何耳！初时极欲大办，今如此局面无望矣。科举一变，则守旧之命脉已断，我辈心愿亦几了矣。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前一封信写于戊戌年五月七日，距翁同龢罢官仅十天，后一封信亦写于五月，时间也很近，这可以视为梁启超闻翁被逐后的最早反应。梁当时就指出：此事“最为大关键”，翁被逐原委“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看来，梁得到了机密消息，或即指废立光绪的阴谋和翁谏天津巡幸，这种官闱秘密不便在信函中明说，只能留待以后见面再谈。梁启超还把康有为、张元济、梁启超的“不能大用”和“无下文”的原因归之于翁同龢的被逐。康梁因此甚为沮丧，康要南下，这和本文前面所引康有为《怀翁常熟去国》一诗的注文中所言符合，梁也决心离京。还说，由于翁氏被逐，虽不能大展抱负，但如果废除科举，断了旧派的血脉，自己的心愿也就了却了。看了这两封信中所说的意见和表露的情绪，谁还能相信翁同龢的罢官是由于翁康矛盾，是出于光绪的主动？

第三位就是光绪皇帝。他是第一当事人，最有作证资格，他虽然没有留下直接的证言，但从其他人所引光绪的谈话中仍可找到间接的证据。

四月二十八日，亦即翁同龢罢官后的第二天，光绪分别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康有为在逃亡时曾与中国邮报记者谈话，提到皇帝的这次召见。当时，康有为向光绪帝陈说不能依靠守旧的大臣们实现变法，“皇帝对这些话的答复是他非常着急，因为实际上他没有黜革这些高级官员的权力。他说，这个权力是握在太后自己手中”。<sup>③</sup>如果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主动黜革了朝中最重要的大臣，自己的老师翁同龢，那么第二天召见康有为时，他不会说自己“没有黜革这些高级官员的权力”。以上的话，正好证明前一天黜革翁同龢是出于西太后的意旨。

慈禧太后怎样黜革翁同龢，并未留下

记录，但从另一个重要官员张荫桓的遭遇中，却可略窥翁同龢被黜逐的情况。张荫桓与翁同龢实际上是同案的被告，两人都赞成变法，都推荐过康有为。同署办公，处理外交，关系密切，又同受御史们参劾。因此翁同龢开缺回籍，张荫桓亦岌岌可危。但张仍安然做官，免受处分，直到维新运动失败，六君子被杀，张荫桓才论罪遣戍新疆。为什么翁同龢被黜逐时，张荫桓未受惩处？张本人透露了一次宫廷高层会议的情况。从这次会议上可以看出，当时是谁在主持对高级官员的惩处。张荫桓后来遣戍新疆，路上同两位押解他的官员王庆保、曹景邠谈到晚清的政治内幕，王、曹二人写成《驿舍探幽录》，其中谈到翁同龢罢黜时张荫桓处境可危，原文较长，但因能看出当时处分高级官员的程序，故全部录出：

“某等因问曰：夏间翁常熟罢官，外间谣传，颇有波及，确否？”

张答曰：今年五月初五有查抄虚警。先是太后密召英年，令传谕崇礼，谓张荫桓有应查办事件，着其预备。是日，太后在颐和园召见庆邸、廖寿恒、刚毅，问近日张荫桓遇事颇为专擅，参奏甚多，尔等有所闻见否？廖寿恒奏对以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唯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太后闻之怒甚，因云：似尔所言，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当下诸臣俱碰头莫敢一言。移时，太后复云：我亦知张荫桓颇能办事，究竟有无专擅之迹。廖寿恒等见太后盛怒，因奏对曰：张荫桓在总理衙门遇有事件，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缘张荫桓所识洋人颇多，凡交涉密议，行踪诡密，旁人不得闻知。时皇上亦侍侧，太后因言张荫桓遇事专擅，皇帝明日叫起人见，可以严加申饬，使知警戒。是日，廖仲山以事过寓，初谈闲话，语次因言及今日在颐和园召对如此如此，太后颇怒，甚代惊恐。余遂向询刚子良曾代我说话否？廖云：

伊亦颇为力言。余意甚不平，因谓本衙门明日亦有事，当递膳牌，俟覲见看皇上若何？

廖仲山辞去，余因出城拜客，次早入朝至军机处，遇庆邸，告以昨日之事甚险，并将奏参专擅营私各折令看。余见谤书盈筐，不胜气忿，意谓圣意万一难回，唯有请皇上罢斥查办，容当上折申辩。看完，当即叫起，同起者，首庆邸，次廖寿恒，次刚毅，时王文韶初入军机，班在第四，连余五人同人。当闻太监传语，张大人垫子在南边，余跪聆皇上谕云：“奏参各折，尔看见否？余奏对云：臣已看过，臣在总理衙门，某事系与某人商议，某事系同某人会办，均可查考。唯某条约，系臣一人专主，然亦众所共知，并未专擅。皇上因向廖寿恒云：尔昨日对太后所言，今日何不陈说？廖寿恒奏对云：昨日太后询问臣等，对以张荫桓在衙门办事，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系属实在，臣不敢欺。

皇上又向刚毅等问：尔有何言，刚毅等唯只碰头，皇上略谕庆邸云：传知张荫桓，不必忧虑着急，仍令好好办事。刚毅因接口传谕云：有恩旨，令张荫桓改过自新。余闻之心中愈觉愤懑，意谓本自无过，何云自新？故当时并未碰头谢恩。皇上旋谕云：尔先下去。余即下来，须臾皆出，我复对庆邸等云：余意仍欲上折申辩。经众相劝，谓一天风雨已散，何必再行多事？因而中止。”

张荫桓这段长篇叙述，略能揭示当时惩处高级官员之程序和内幕。第一，翁、张本属同案，同时受弹劾。这年闰三月安徽藩司于荫霖劾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误国无状”，四月，御史王鹏运劾翁同龢、张荫桓“朋谋纳贿”；第二，四月二十七日，翁被黜逐，八天以后，即五月初五日，讨论对张荫桓的处理；第三，对张荫桓的处理，完全由西太后主持，开始时太后“盛怒”，已

令崇礼“预备”。崇礼时为步军统领，职司卫戍，后来政变时六君子即是步军统领衙门捕拿和正法的。可见西太后本欲将张荫桓捕拿下狱。第四，张荫桓所以免罪是廖寿恒、刚毅竭力帮着说话，尤其是刚毅的进言，使太后息怒。当时，刚毅极得太后宠信。故张荫桓向廖寿恒打听“刚子良曾代我说话否？”张荫桓知道，刚毅的话最能起作用。第五，光绪虽参加了会议，却一言未发，他不赞成西太后意旨，但又不敢违拗。第六，太后对张荫桓的态度缓和后，仍令光绪帝出面，对张“严加申饬，使知警戒”，似乎处理过程均由皇帝主持，使运作程序合法化。实际上，太后操纵一切，光绪只能奉命唯谨。第七，翌日，光绪帝召见张荫桓，语气温和，劝慰有加，并未“严加申饬”，和太后的盛怒，迥然不同，这体现了皇帝和太后对此案的不同态度。

由处理张荫桓的会议，可以推想八天前处理翁同龢的情况。两人本属同案，而翁的资历、威望、官职皆在张荫桓之上，要黜逐他，至少也要经过类似级别的会议。西太后从甲午战争以后，因翁的主战与节减庆典经费，积憾已非一日，加上荣禄、刚毅日进谗言，其盛怒亦可想见。会议上，除光绪可能曾为其师傅求情而遭申斥外，刚毅只能落井下石，所以翁同龢遭谴是必然的。但翁同龢毕竟是两朝帝师，又无明确罪状，西太后只能处以开缺回籍，而未被押拿下狱，但最后处分仍以光绪帝谕旨的形式宣布，这是亲政后的合法程序。处分翁同龢的过程，我们找不到直接记载，但从张荫桓的谈话中，处理此案系何人主持，何人操纵，已可洞若观火。

以下，再看看翁同龢的学生是如何看待此事的。翁氏的学生叶昌炽、唐文治当时都在北京，经常出入翁门。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记载：“二十八日晨，阅邸抄，虞山师奉旨放归，朝局岌岌不可终日。……二十九日，谒虞山师未值，佩鹤来云，虞山之去，木讷令兄实挤之，或

云与郎亭师一案”，又“七月十二日至别墅，适弢甫在允之座，谈极久；瓶师（指翁同龢）之归，木讷令兄有力焉。”

“木讷”即刚毅，叶昌炽认为，翁同龢的开缺回籍是刚毅进谗所致，这是他听弢甫所言。弢甫是翁同龢之侄翁斌孙，常年随侍翁同龢。“或云与郎亭师一案”中，郎亭即汪鸣銮。汪也是翁的学生，“翁门六子”之第一人，光绪二十一年冬与长麟一起被革职，其罪名是“妄事揣摩，辄于召对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见，信口妄言，迹近离间”，<sup>④</sup>这是帝后党争中的一幕。叶昌炽和他的朋友们都认为，翁的黜逐是受了后党的排挤。

另一个学生唐文治在他的《茹经堂文集》中有《纪翁文恭公事》一节，称“戊戌春，公保工部主事康有为通达时务可用，刚（即刚毅）随密奏太后，谓公植党荧惑圣听，四月二十四日（应为二十七日，此处系误记），公奉旨开缺回籍，是日，适公生辰也。呜呼！刚之计可谓巧而毒矣。公丝毫不愠色，越数日，即行，至正阳门外，送者数百人，车马阗咽，有痛哭流涕者。公独坦然谓文治曰：‘人臣黜陟，皆属天恩，吾进退裕如，所恨者不能复见皇上耳。’唐文治和叶昌炽一样也认为翁的罢官是刚毅进谗言所致。叶、唐二人皆翁门弟子，当时又皆在北京，亲见翁的黜逐，他们所说的话，可信程度当是很高的。

另一个虽非翁门弟子，身在上海，但与帝党和维新派关系密切的郑孝胥在听到翁同龢罢官的消息后，就知道是守旧派排挤所致。他在四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七日，翁既逐出，拟旨者乃刚毅、钱应浦、廖寿恒等也。度其情形，翁必力主上以变法自强，满洲人及守旧之党，遂构于太后而去之。翁去则上孤，而太后之焰复炽，满朝皆仓楚，而亡在旦夕矣。”<sup>⑤</sup>郑孝胥熟知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派系分野。他虽身在上海，却在翁罢黜后的第三天（二十九日）得到电讯，即时在日记中作出上述反应。

一位不知姓名的维新派，政变后逃至日本，给日本政府和会社写了一封信，缕述政变原因，其中把翁同龢被逐视为西太后剪除光绪羽翼的措施，“皇上年既渐长，而外患亦日弥。数年以来，屢思发愤改革，皆受制于西后。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加遣逐，甲午年之窜安维峻，乙未年之褫长麟、汪鸣銮、文廷式，今年四月之逐翁同龢，皆此类也。盖其意务欲剪尽皇上之羽翼，去尽皇上之腹心，使皇上孤立于上，然后能任其所欲为，此历年以来西后夺权之实情也”。<sup>⑥</sup>此人看法与梁启超、郑孝胥相同。

我们再看看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是如何看待此事的：

一个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他在中国办报多年，交游甚广，曾替翁同龢起草维新计划。他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恭亲王于六月间死去，照惯例翁同龢应该补他的缺，但是慈禧将职位昇予了他的亲戚及忠心拥护者荣禄，而把翁同龢免了职，这个举动虽然发生在政变前的三个月，但对于皇帝对慈禧的短期的独立来说是第一次的打击。翁同龢免职后，慈禧临朝，命令各大臣直接向她呈奏。”李提摩太认为：翁同龢开缺，是西太后对光绪的一次打击。

另一个外国人艾·爱·贺璧理，当时住在天津，担任海关税务司，他听到翁开缺后五天，写信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说道：“15日的诏书（阳历6月15日，阴历为四月二十七日，诏书即翁开缺回籍的谕旨）构成了一次政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即使不是真正废黜了，也是实际上废黜了皇帝，这样说不算夸大。……慈禧太后胁迫这位可怜的年青皇帝革去了他的最忠诚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职”。<sup>⑦</sup>这位外国人甚至把翁同龢罢官等同于“实际上废黜了皇帝”。对照光绪主动罢免翁同龢之说，差距何啻十万八千里？

我们还可以找到当时许多熟谙晚清政局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苏继祖是一位同情变法维新的历史学

家，他写了《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四月二十七日，“谕旨三道（即翁同龢开缺，召王文韶入京，荣禄署直隶总督）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左右近臣告人曰‘可笑皇上必叫老翁下了镇物了’。”苏继祖所言光绪的态度，和梁启超所言“战栗变色”是一致的。他写得这样具体，当有所闻而非揣测之词。

另一位历史学家黄鸿寿撰《清史纪事本末》，其中说：“同龢在毓庆宫授帝读最久，因鉴于事变，非变法不足图存，时为陈说于帝前，为太后所闻，撤同龢毓庆宫行走。其荐康有为也，谓‘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太后尤恶其语。又其时天津阅兵废立之谋，渐有所闻，同龢密言于帝，太后侦知之，遂命开缺回籍。”这里所说翁同龢反对巡幸天津而遭罢黜，也与梁启超所说符合。

胡思敬是反对维新变法的，他所写的《戊戌履霜录》对维新措施抨击颇多。他也说：“或潜翁同龢于太后，太后恶之，又追咎中东战事，免其官，放归田里。”“翁同龢以毓庆宫旧恩，颇蒙宠幸。奕訢没，太后疑变政之举，皆同龢响导，逐之去位，上孤立失所恃。”胡思敬虽为守旧的历史学家，但所言翁同龢的罢逐，与其他人所言是一致的。

还可以举出其他历史学家的话：

恽毓鼎是长期陪侍光绪帝的臣僚。他在《崇陵传信录》中说：“先是钱塘汪侍郎鸣銮奏对当圣意，屡召见有所陈，太后闻而恶之。忽传懿旨以迹近离间褫汪职，因此尤忌翁，猝用硃笔逐之，盖不欲其在上左右也。”他把翁的被黜与汪鸣銮的褫职联系在一起。

另一位为慈禧立传的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中说：“奕訢、李鸿藻相继歿，荣禄遂替密勿，然事皆同龢主之。……荣禄嘱莲英言于后，谓同龢专横。且劝帝游历外洋，后闻大骇，召帝诘之，帝辩无是事，后

弗信，竟自为旨，逐同龢去。”他把翁的罢黜归之于荣禄的谗譖。

金梁在《四朝佚闻》中则把翁的黜逐归之于奕訢临终时的遗言：“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拂然，常人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而恭久受挫，积憾尤深。病笃临视，太后问以遗言，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遂骤下罢斥之谕，或谓孙（指孙毓汶）实代草，所述皆翁对恭状，而引入严旨，乃成跋扈权臣矣！翁实不能负此重咎也。”

此外，陈夔龙、张元济、罗惇龢等人所言亦相类似，此不赘引。这里不管是维新派、帝党官僚、守旧派、历史学家或外国人，无不把翁开缺回籍归之于守旧大臣的排挤和西太后的意旨，虽在具体情节上稍有差异，但慈禧之黜逐翁同龢，众口一词，已成信史。现在时隔几十年，仅因翁同龢日记中所说光绪曾几次责备翁同龢，翁自言与康有为“不往来”，称康“居心叵测”，由此推论因翁康产生矛盾，关系已决裂，光绪袒护康有为而罢黜翁同龢，这种推论实难令人信服。除非能够证明以上所引大量证词俱为虚妄伪说，则光绪罢黜翁同龢之说不能成立。

即使完全相信翁同龢日记中所说光绪曾多次责备翁同龢，也得不出光绪会主动黜逐翁的结论，责备与黜逐不是一回事。光绪帝年轻气盛，甲午战败后，忧愁焦虑，急思变法自强，与大臣议政时多所责难，但不能因有责备即认为光绪帝主动罢黜了翁同龢。光绪帝当时完全了解阻挠变法的是一大群守旧官僚，无论如何，他也不应自坏长城，黜逐当权大臣中唯一支持变法的人。如果光緒果真拥有罢免高级官员的权力，首先该罢免荣禄、刚毅之流，而不会拿自己的师傅翁同龢开刀。

肖公权先生从翁同龢黜逐前夕的日记中找出光绪责备翁的材料，便断言翁的黜逐出于光绪的意旨。同样，我们更可以找到此时光绪和翁同龢关系融洽的材料，以反

证翁被黜逐绝非出于光绪本人的意旨。

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翁同龢被黜逐的前五天，光绪帝命翁同龢草拟《定国是诏》，这是宣布变法，确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文件，翌日，宣布此诏书，百日维新从此开始。翁的学生张謇曾在翁书房中亲见“虞山所拟变法谕旨”。<sup>⑧</sup>如果光绪不信任翁同龢，意欲立即黜逐他，又怎么会把这样重要的变法文件交给他起草呢？

即使在翁的日记中，不少地方也表现出当时光绪对翁同龢的眷念与关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翁召对时，突发汗症旧疾，光绪很着急，令太监扶掖，送归寓所，又派大臣前往看视。对此翁同龢很受感动，说道：“圣恩如此，自憾衰残，无一报称。”三月，翁又受凉发烧，病三日。光绪帝向大臣们“屡问翁某病势如何？垂问諄至”。翁病愈入值，光绪又“垂问再三，问昨归途如何？到家如何？饮食如何？”翁同龢对皇帝的关心“感激无地”，从这些记载中丝毫看不出他们君臣师生之间的关系已达破裂程度。

翁同龢罢黜前三天（四月二十四日），戊戌科新进士传胪唱名，状元为贵州夏同龢。召见军机时，光绪对翁同龢说：“今科状元夏同龢与师傅同名，诚为佳话，足见君臣一德，遭际攸隆。”<sup>⑨</sup>如果三天以后光绪准备黜逐翁同龢，当无这种高兴的表现。

翁同龢黜逐之日（四月二十七日），适逢翁的生日，后党对翁切齿痛恨，故而偏偏选择这一天下谕黜逐翁，以示羞辱。如果出于光绪帝一时冲动，罢免师傅，他和翁相处日久，感情很深，当不会选定这个日子去刺激年迈的师傅。

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原由似乎是个小问题，但它涉及戊戌时代的党派分野与对翁同龢的评价。如果翁为慈禧所逐，表明了这是后党有计划进攻的重要一步；如果翁为光绪帝所逐，只能说明维新阵营内部的同室操戈和失去理性，而对翁同龢的评价亦应随之而异。肖公权先生在论述翁的黜逐出于光绪意旨的同时，又严厉地抨击翁，说

翁被黜逐，不仅是翁同龢、康有为意见分歧所致，而且还因为翁妒忌康有为，与康争夺权力，批评翁在政治上没有原则，时而反对新政，反对修建铁路，时而又支持变法，支持维新。又说翁的主张是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经常改变态度，没有一贯立场，“翁尝试排除康氏，却反而迅速导致自己的失势”。

诚然，翁同龢是出身名门，笃信旧学，受传统教育的老臣，和康有为等具有较激进改革思想的人不可能完全一致。翁对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表露的历史观、政治观也不会赞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变法的支持。正如湖南巡抚陈宝箴，曾竭力反对康的著作，上奏请求劈版禁毁，但并不妨碍他在维新运动中支持康梁，在湖南积极推行新政。翁同龢当时和光绪帝、康有为一样忧心国事，谋求变法，因此，他们能够成为一条阵线上的同盟者。翁同龢举荐康有为，表现了求贤若渴的忧国襟怀，故康有为终身不忘，把翁称作“维新第一人”，比作汉初的萧何。肖公权先生把翁之荐康解释成翁为利用康有为以排斥李鸿章、张之洞等政敌。而当康声望提高，被旧党攻击，翁又怀着“自保”和“妒忌”的心理，疏远和排挤康有为，结果反被光绪和康有为黜逐。事实几乎全被颠倒，敌友关系随意置换。这种分析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是片面而无根据的。

李鸿章从甲午战争以后，声望大减。戊戌时他虽不是翁同龢的同道，但也并非主要政敌。张之洞远在湖北，更说不上与翁有严重矛盾，翁同龢何必要利用康有为去排挤他们？再说，康有为以小小的六品主事，并没有排挤李鸿章、张之洞的力量，以后康有为声望提高，也构不成对翁同龢的威胁，所谓“利用”、“妒忌”、“排挤”、“争夺领导权”等纯系主观想象。

肖公权先生除了举出翁同龢为了避祸而努力与康有为划清界线，其日记显然经过改写外，并未找出翁同龢改变初衷，排挤



康有为、与康争权的任何证据。其实，当时翁同龢、康有为以至光绪皇帝都没有真正的权力，他们只有联合起来，向后党争取权力。故翁同龢被逐，康有为“甚为灰冷”，翁康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至于翁同龢的言论、行动，前后确有矛盾。他曾反对修建津通铁路和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津、京汉铁路），表现出保守的倾向；他进呈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后又引荐康有为，支持变法，表现出进步的倾向。但这并不奇怪，这是近代历史人物身上普遍具有的特征。由于近代历史发展变化很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然随之变化，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经常会发表不同的言论，其观点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翁同龢不赞成开设同文馆，主张缓修津通铁路（这里不完全是思想保守，还有财政上的考虑），这姑且算作其思想保守的证据，但后来他的思想却有所变化，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急谋变法，奋力图强，对这种顺应时代的爱国主张，又怎能视为“政治上无原则”、“没有一贯立场”？同时代的人物，如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甲午战争前夕曾上书

李鸿章，表现了改良思想的倾向，但甲午战争中，目睹清廷的腐败无能，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组织了兴中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前进。梁启超说过，自己常常“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这恰恰也是他能够随着时代不断前进的优点。翁同龢毕竟出身封建官宦家庭，在他身上自然会表现出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但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他却能反对妥协，力主抵抗，举荐贤才，支持变法，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和革新勇气，这在当时的大官僚中并不多见，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①② 见肖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

③ 《中国的危机》，见香港《字林西报周刊》1898年10月7日。

④ 《清史稿》卷四四二。

⑤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⑥ 原载《新知报》第79册，转引自《戊戌变法》二，602页。

⑦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107页。

⑧ 《张謇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⑨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责任编辑：左远波）